

【一般論文】

不合時宜的吟遊詩人之聲： 「撒旦磨坊」與市場社會*

許甘霖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劉邦立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The Voice of the Anachronic Bard:
“Satanic Mill” and Market Society

by

Kan-Lin Hs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kanlin@thu.edu.tw

Pang-Li Liu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lpl@csmu.edu.tw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第五屆藝術社會學研討會：文學與社會」（東海大學，2018）及「第十屆海峽兩岸暨香港社會學學術研討會」（西南財經大學，2019）。作者感謝持續修改過程中蔡博方、蘇碩斌、蔡永順、趙剛、黃崇憲等多位先進，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評論意見和修改建議。

收稿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10 月 22 日

摘 要

本文檢視博蘭尼和布雷克作品中「撒旦磨坊」相關語境的關鍵字，透過文本內關聯性和互文性分析，發現博蘭尼「撒旦磨坊」的具體指涉是包括濟貧制度和相關機構設施在內，透過道德改造將勞動力轉化為虛構商品並使之適應競爭性勞動市場所需紀律的社會機制。而布雷克以「心靈鍛造的鐐銬」批判人類藉著抽象的人性概念合理化自身無視同類苦難的態度。據此「布雷克視角」重新詮釋《鉅變》，本文認為博蘭尼的「抽象概念組成的人性形象」呼應布雷克的「心靈鍛造的鐐銬」，他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人預設」和「市場心態」悖離基督教根本精神而成為社會錯位的根源。通過馬革頓教派反律法主義的人性概念，博蘭尼賡續了布雷克對工業主義文明的批判。

關鍵詞：基督教的人性概念、博蘭尼、市場社會、浪漫主義神學、布雷克

一、前言

博蘭尼 (Karl Polanyi) 的《鉅變：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001/1944) (下文簡稱《鉅變》，引述為 *GT*；中譯版黃樹民譯，2017) 其章節結構是這樣的：第一部「國際體系」提出歐洲百年和平及其崩潰這個難解的歷史之謎，並以均勢 (balance of power)、國際金本位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自我調節市場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和自由主義國家 (the liberal state) 這四個制度為解答；第二部「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 展開逆推論證 (retroductive argumentation)，包括「撒旦磨坊」和「社會的自我保護」這兩篇，依序分析自我調節市場成為社會組織化原則的歷史過程，以及在這過程中社會各階層回應市場經濟威脅的自我保護措施；第三部「進行中的轉變」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對自我調節市場的干預措施，將之理解為勞動、土地和貨幣撤出市場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佐證第二部提出的論點，並前瞻未來。

第二部第一篇的標題——「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典出英國神秘主義詩人威廉布雷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 的詩作殆無爭議。然而，就包含《鉅變》最原創性章節的標題來說，既有文獻對博蘭尼與布雷克間的可能關聯、甚至對「撒旦磨坊」意涵的討論卻寥寥無幾，即便有也是語焉不詳。¹ 這個關注度與標題醒目度不成

¹ 如 Özveren (2007: 185) 指出，很少人注意到博蘭尼透過以「撒旦磨坊」為《鉅變》中最具原創性部分的標題，在布雷克的詩裡找到庇護。此外，《鉅變》的精神深受回應工業革命而起之英國浪漫主義的影響；但該作者也沒說明到底是怎樣的影響。

airiti

比例的反差，可能出於三個原因。其一是某種「科學主義」的學院派傾向：《鉅變》的主要論點受質疑，如因 Granovetter (1985) 的解讀而廣為人知的「經濟鑲嵌 vs. 經濟脫嵌」悖論。若再細究與實質論證看起來無關的修辭風格，似乎無助於該書的學術價值。McRobbie (2000: 85) 就認為，《鉅變》剛出版時之所以乏人關注，可能是因該書所呈現的比較像是個綜合性的先見之明而非有待來者超越的研究成果。其二是囿於成見：「撒旦磨坊」是英國文學特有的典故，已成英國人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在「工業化初期勞動條件惡劣的血汗工廠」之外難有其他想像。底下引自部落格文章的文字很具代表性：

當我們想到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很容易浮現的圖像是威廉布雷克的「陰沉撒旦磨坊」(*Jerusalem*) 吐出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稱的「煙蛇」(serpents of smoke) (*Hard Times*)，荼毒地方民眾、剝削勞動力，以致於看不到希望而讓無數人「帶著厭世的念頭工作和生活著」(Charlotte Brontë 的 *Shirley*)。(White, 2017)

在這段文字裡，布雷克的「陰沉撒旦磨坊」，就像狄更斯在 *Hard Times* (1907) 裡以「煙蛇」形容工廠排放的黑煙和「鬱狂大象頭顱」(the head of an elephant in a state of melancholy madness) 形容蒸汽機活塞運動，都是將工業革命時代生活場景和社會境況形象化的修辭手法。其三是博蘭尼《鉅變》後發表的著作在文字風格上有明顯的轉變，不復見《鉅變》特有的文學性修辭，若以學術文類的眼光閱讀《鉅變》，或許會將這些文學修辭當成寫作風格而忽略可能的有意指

涉。² 然而，至少在《鉅變》撰寫期間，博蘭尼還算不上學院學者，寫作風格不像建制化的學術文類，且對布雷克和博蘭尼這種虔誠的基督徒來說，撒旦、摩西和先知這類語彙都可能有實質指涉或至少有別於通俗隱喻。此外，就《鉅變》裡出現的各種充滿宗教隱喻的措辭和修飾語來說（如「人的形象的褻瀆」、「世俗沉淪哲學」），博蘭尼若不是特別偏愛宗教隱喻，「撒旦磨坊」就可能是具有論證相關性的具體指涉。在《鉅變》第一章，博蘭尼提醒讀者該書體裁的特性：

本書**不是**歷史著作；我們不是為重大事件找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次序，而是從人類制度的角度對這些事件的趨向提出解釋：我們將根據理解當前問題這單一目標任意思索過去的境況；將詳細分析某些關鍵時期而幾乎完全不考慮相連接的時期；將跨越幾個學科領域以追求這單一目的。（*GT*: 4；黑體為原作者強調）

這個提醒要求讀者根據該書自身的特性來閱讀：知往鑒今，從人類制度的角度檢視重大歷史事件與當前的重要關聯。

根據博蘭尼女兒 Kari Polanyi-Levitt（1990）的線索（後詳），本文提出一個新的閱讀視角：《鉅變》裡的「撒旦磨坊」既是宗教隱喻的修辭手法，也有具體指涉。透過互文性和文本內關聯性分析，本文重新詮釋《鉅變》裡「撒旦磨坊」的兩層意涵：第一層政治經濟學意涵是環繞著濟貧制度及相關機構設施的一整套以改造人性、打造競爭

² 根據博蘭尼傳記作者的紀錄，博蘭尼移居英國後努力取得正式的大學教職，但因缺乏認可的學術著作而一直沒有成功（Dale, 2016）。194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教學職位後，博蘭尼對於學院的教學研究生生活十分滿意，學術生產力也達到高峰，寫作風格更接近建制化的學術文類。

性勞動市場所需之（虛構）商品和勞動紀律為目的的社會機制。引入布雷克要素後得出第二層浪漫主義神學意涵：這套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基礎——理性的經濟人——悖離基督教「人按上帝形象受造」因而應彼此相愛的神性形象，但以抽象的人性預設為基礎的形式經濟學，卻倡議將社會和自然的命運托付不屬人定法的市場規律來支配。這兩層意涵才是《鉅變》裡「撒旦磨坊」——以撒旦化身的理性為主宰——的完整意義。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檢視既有少數對「撒旦磨坊」的詮釋，指出「工業主義初期的血汗工廠」這種理解，無法解釋「撒旦磨坊」造成的文化退化與勞動成為虛構商品之間的關係；第三節根據 Kari Polanyi-Levitt 的線索（布雷克要素），聚焦於幾個關鍵字的文本內關聯性分析，指出「撒旦磨坊」的具體指涉是環繞著濟貧制度及相關機構設施的一整套以改造人性、打造出競爭性勞動市場所需之（虛構）商品勞動力和勞動紀律為目的的社會機制。第四節從馬革頓教派反律法主義（Muggletonian antinomianism）的角度，將布雷克作品中的「撒旦磨坊」理解為以撒旦化之理性為主宰的社會制度；第五節根據這個布雷克視角，將《鉅變》裡的「撒旦磨坊」重新解讀為以特定人性抽象——理性的經濟人——為基礎、自我調節市場為組織化原則的社會；第六節以馬克思（Karl Marx）、韋伯（Max Weber）和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相關理論概念為參照點，嘗試定位《鉅變》論點的獨特性；最後總結本文的分析，指出如此重新詮釋的《鉅變》，提供某種博蘭尼取徑的生命政治理論要素。

二、工業主義初期的血汗工廠？迄今的解讀

對《鉅變》裡「撒旦磨坊」的詮釋從血汗工廠、自我調節市場、工業革命到工業資本主義都有，但幾乎都看成隱喻的修辭手法。第一種詮釋將「撒旦磨坊」視為《鉅變》整體文學表現形式的一部分，而未觸及其具體意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Kenneth McRobbie (2000) 的〈文學與《鉅變》〉(“Literature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cRobbie 認為，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的社會苦難啟發了博蘭尼對英國工人階級在這過程中文化退化的沉痛理解。1930 年代旅居英倫期間又目睹這種退化出人意料地延續普遍，與歐陸工人階級의 自豪感形成強烈對比。人類成為完善存有的可能未來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被剝奪？為何英國工人無法倖免於這場文化災難？博蘭尼深信人類若被剝奪生存權，將起而反抗資本主義，因而精心運用文學表現手法來呈現這場精神與文化的復興。³ 他大量運用諷刺、對比、弔詭和矛盾等隱喻，來表現隨著工業革命登上世界舞台後，人類如何受物的法則宰制所展現的生死劇。根據 McRobbie 的計算，博蘭尼總共用了 75 個可細分為七類的修飾語 (epithet) 來表現市場經濟興起過程對人類和自然的衝擊。⁴

³ McRobbie 認為博蘭尼深受匈牙利無產階級詩人阿蒂拉 (Attila József) 的影響，後者曾寫過「道出真實，而不僅僅說出事實」(Say what is true, not merely what is factual) 詩句 (2000: 102 n. 2)。

⁴ McRobbie (2000: 103 n. 26) 引述的句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質體 (the substance of the race) 造成的可怕傷害」(GT: 22)；怎樣的「撒旦磨坊」(satanic mill) 將人們輾碎成散眾？(GT: 35)；輾磨人們生活的市場磨盤 (the mill of the market)(GT: 234)；勞動磨盤 (the labor mill)(GT: 86)。

最明顯的是與表達工業體系之摧毀性和災變性質相關的 13 個修飾語。這類災難侵襲無助的人類導致個體被打磨成散眾⁵——「mill」的隱喻次數最多（然未承認典出威廉布雷克）。用來描述由此而產生的弊端、道德退化、麻木和心理不安的修飾語不少於 15 個；形容疾病、衰退和總體恐怖的修飾語有 4 個。最精心構思的隱喻是水，象徵不穩定、流動性、不受支配的力量，以及社會被金融群鯊巡遊其中、擴及七大洋的「市場大漩渦」吞沒；這類修飾語約 20 個，其中幾個超乎密集地出現在第二頁。（McRobbie, 2000: 90）

雖然 McRobbie 鉅細靡遺地羅列《鉅變》裡文學表現手法與特定文學家的關係，卻未分析「撒旦磨坊」這個顯眼且典故明確的隱喻，且從唯一間接相關的語境來看意為「邪惡的」：

金本位就像個新的神明，也是「現代的信仰」、「無形的實在」，甚至是個邪惡的教義（satanistic creed），造成「天堂與地獄間的戰爭」。（McRobbie, 2000: 93；引號內為引自 *GT* 的文字）

博蘭尼的《鉅變》確實不尋常地大量運用就學術文類而言少見的文學表現形式，雖然適切的修辭可以讓論證更具說服力，但若僅是強化與論證品質無關的修辭效果——特別是激起道德情緒的效果——則會損及《鉅變》論證的完整性。因為這類道德說服的修辭隱含伸張公義的召喚，而讓讀者有表態的壓力（Sayer, 2010: 178）。

⁵ 作者按：博蘭尼的原文為「把人們碾碎成散眾」（ground men into masses）（*GT*: 35）；原誤照引。

第二種詮釋將「撒旦磨坊」理解為「工業主義初期血汗工廠」的象徵，最具代表性的是 Fred Block。Block 發現博蘭尼旅居英國期間在勞工教育協會的授課筆記與《鉅變》裡的術語存在某些不連續性：⁶博蘭尼在 1937 至 1938 年間講授「16 世紀以來英格蘭的經濟、社會及工業史」課程的授課筆記裡提出「工業革命對我們提出一個問題：這個世紀的生產力大大提升，但國家和人民卻處於悲慘的境況。如何解釋？」這個關鍵問題，而以「工業革命是社會革命，創造了一個自身有諸多問題和某種特徵的新文明」為答案，接下來幾次授課聚焦於「該歷史階段的各種恐怖——撒旦磨坊 (the Satanic mills)、童工、早期規約勞動之法律制度的拆解，以及《濟貧法》」(Block, 2003: 279)。博蘭尼對《濟貧法》的分析總結如下：

最糟的影響是對鄉村人口的衝擊：史賓漢連制度完成了圈地和併地的工作。貧困和失業賦閒打碎了將鄉下人束縛在土地上的最後鏈條，驅迫他退化、冷漠而在城市的勞動市場裡完全喪失獨立自主。……但失業意味著後果最惡劣的教區救濟。這個國家有相當數量的人口因此淪為奴隸而蒙羞。這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心靈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引自 Block, 2003: 280)

Block 指出，博蘭尼 1930 年代的英文寫作裡明顯可見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在 1941 至 1943 年移居美國撰寫《鉅變》期間消失了：看不到「生產力」和「統治階級」，且以「市場社會」取代「資本主

⁶ 博蘭尼 1933 年被迫離開維也納移居英國後，在提供成人教育服務的工人教育協會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教授夜間課程。

義」。⁷ 有學者認為這是迴避政治困擾的寫作策略，而 Block 認為這是因博蘭尼已發展出虛構商品和鑲嵌性經濟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產生更大的張力，⁸ 因為這概念同時挑戰市場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存在一個受自身內在邏輯支配、分析上自主的經濟」的預設，但博蘭尼認為實存的市場經濟仰賴國家機器確保虛構商品的供給，因而並不存在一個分析上自主的經濟（Block and Somers, 2016: 79）。根據新的概念視角，

博蘭尼強調政府強制的角色，使貧民習藝所裡可怕和退化的體驗成為英國平民在飢餓之外的唯一出路，而接受工業主義初期「陰沉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的勞動條件。…工業化初期的種種恐怖，包括陰沉撒旦磨坊（Satanic mills）、兒童因 16-18 小時工作日導致身體傷殘、早期工業城市的骯髒和道德退化。…特別是一小群工廠主，他們讓工業化初期的勞工家庭除了進入嚴酷撒旦磨坊（harsh Satanic mills）工作之外別無選擇，因而承受巨大的痛苦。（Block and Somers, 2016: 37, 108, 235）

從這些引文的語境來看，Block 顯然將《鉅變》裡的「Satanic mills」理解為象徵工業主義初期，平民因政府包括濟貧制度在內的強制手段所驅迫而進入的、勞動條件惡劣駭人的「血汗工廠」；而此時勞動已成受市場機制調節的虛構商品。這也是廣為接受的詮釋，如

⁷ 其實，博蘭尼在《鉅變》出版後寫的“*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1947）這篇文章裡，短短 8 頁就出現 7 次「capitalism」。

⁸ 博蘭尼特別在註腳強調「馬克思關於商品價值之拜物教特徵的主張，指的是真實商品的交換價值，與此處的虛構商品毫無共同之處」（*GT*: 76 n.）。

「企圖實現不受規制的市場經濟，結果就是狄更斯和其他作家所稱的 18 至 19 世紀英格蘭工業經濟的『撒旦磨坊』。⁹ 但因幾個世紀以來的勞工組織化，撒旦磨坊在已開發國家多已成為過去，但仍見於開發中國家」（Flomenhoft, 2016: 98）。又如「1834 年廢除舊的《濟貧法》來支持貧民習藝所的運作，但這個制度的設計刻意迫人退化而讓工人在布雷克陰暗、惡魔般邪惡的工廠裡接受淒涼的勞動市場薪資」（Kuttner, 2014: 98）。

將「撒旦磨坊」理解為「工業化初期階段、自我調節市場支配下勞動條件惡劣的血汗工廠」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合理：「撒旦」在西方社會裡的通俗隱喻加上「mill」的多重意涵，確實很生動的表達「魔鬼般邪惡」的資本家藉著「惡劣駭人」的勞動條件和「惡質」手法剝削勞動階級，造成包括道德退化在內的種種「恐怖」。但這種「撒旦磨坊不過是修辭」的詮釋卻造成一個尷尬的問題：描述工業主義初期勞動階級境況的著作汗牛充棟，難道博蘭尼的原創性不過是修辭？

有個線索或能有助於脫離這個窘境。根據博蘭尼青年時代好友 Felix Schafer（1990）回憶，博蘭尼《鉅變》的基本論點在維也納時期已具雛形，包括從馬克思著作直接推衍出來的虛構商品概念，而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歧則是堅持資本主義的主要罪惡是文化退化（cultural degradation）而不僅是經濟剝削（economic exploitation）。Kari Polanyi-Levitt 同意 Felix Schafer 的說法，但她堅信，

從紅色維也納移居英國貧民區的衝擊、布雷克的「陰沉撒旦磨坊」在英格蘭「翠綠歡愉土地」的面容和工業勞動階級心靈上留下的傷痕，深深烙在卡爾（博蘭尼）和我的意識裡。……。

⁹ 作者按：應為布雷克的誤植，原誤照引。

有 1930 年代在英格蘭的直接經歷，才能解釋《鉅變》裡控訴有產階級「為改良犧牲安居」那些文字裡的激情。(Polanyi-Levitt, 1990: 123)¹⁰

這個線索有兩個重點：首先，「撒旦磨坊」的重要關聯是「市場經濟與文化退化」而不是「生產工具私有制與經濟剝削」，但前述的通俗理解卻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經濟剝削意義下的勞動條件；其次，博蘭尼的「撒旦磨坊」確實呼應布雷克的特定作品——*Milton: A Poem*，且描述的主要是 1795 年史賓漢連制度到 1834 年《新濟貧法》這段「工業革命最活耀的時期」(GT: 81)——也是布雷克創作力高峰的時期。雖然英國的工廠制度確立於 18 世紀末 (Walker, 1993: 187-188)，¹¹ 但博蘭尼認為「英國直到 1834 年才建立起一個競爭性的勞動市場，因此工業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制度在此之前不能說已經存在」(GT: 87)。換句話說，「撒旦磨坊」的出現早於競爭性勞動市場的形成，甚至是後者的社會前提。

就什麼意義而言「撒旦磨坊」是文化退化的成因？又以何種方式促成競爭性勞動市場的形成？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回到布雷克的「撒旦磨坊」，但在這之前得先確認「撒旦磨坊」在《鉅變》裡的具體指涉。

¹⁰ Kari Polanyi Levitt (1923~) 是加拿大經濟學家，現任 McGill University 經濟學榮譽教授，也是博蘭尼遺稿保管人。她 1933 年隨父親移居英國，博蘭尼結束在英國工人協會授課期間 (1936-1940) 到美國任教後，她繼續留下來就讀倫敦政經學院，直到 1947 年畢業後移居加拿大。

¹¹ 如 Eric Hobsbawm (1962: 4) 對雙元革命這歷史階段的分期始於 1789 年蘭卡斯特郡第一個工廠制度的建立和法國大革命，結束於第一個鐵路網的建立和《共產黨宣言》的出版。

三、政治經濟學意涵：改造人性以打造競爭性勞動市場的社會機制

博蘭尼在《鉅變》裡頻繁使用三個高度交互指涉的字彙——mill、dislocation 和 habitation。這三個英文字彙並不生僻，但因語境特性而有論證的關聯性，是詮釋「撒旦磨坊」的重要依據。首先，英文「mill」具有多重意義，包括研磨粉碎的器具（如石磨）、從事研磨作業的作坊或車間（如磨坊）、運用機器生產的工業設施（如棉紡廠），以及折磨人的機構或處境（如監獄）等。「Mill」在《鉅變》裡共出現 13 次，可細分為 4 類語意。第一類指涉採用機器生產的工業設施，如：

在這個過程的進展還不是很大之前，勞動人民已經湧入新的荒場（desolation）——所謂英格蘭的工業城鎮；鄉下人失去人性而成為貧民窟的住民；家庭處在毀滅的邊緣；「撒旦磨坊」（satanic mills）嘔出的大量煤渣和廢料迅速吞噬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持有各種觀點的作家和政黨，無論是保守派或自由派、資本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都把工業革命下的這些社會境況看成人類退化的真正深淵。（*GT*: 41；黑體為作者強調）¹²

¹² 其他包括：溫和的慈善家們冷酷地倡議精神折磨並得心應手地付諸實踐，成為潤滑勞動磨盤（the labor mill）齒輪的手段（*GT*: 86）；「這些粗鄙的工人或受高工資的吸引或被狡猾的圈地者驅逐而到早期的工廠（the early mills）裡做苦工」（*GT*: 103）；「新的棉紗廠（cotton mills）不再是為了迎合無用的炫耀而是滿足平實的日常需要」（*GT*: 114）；「地方當局樂於利用棉紗廠（cotton mills）對貧困孩童的意外需求」（*GT*: 121）；「資本主義的企業主是如此渴望以貧民填滿工廠（mills），甚至願意付錢來取得這些貧民的勞務」（*GT*: 121）；「教會與莊園鼓動人民反對工廠主（mill-owner）」（*GT*: 174）；「英法工

第二類指涉與機器生產相適應的**勞動市場**這種社會制度，如：

人為地讓人淪落到這種境況，是史賓漢連制度最大的罪孽。這種曖昧人道主義的行動阻礙勞動者將自身打造成一個經濟階級，並剝奪他們逃離注定淪落經濟磨盤（the economic mill）的唯一手段。（*GT*: 103）¹³

第三類語意是圓形監獄這類「道德改造」的社會機構：

邊沁（Jeremy Bentham）的圓形監獄不僅是個「把流氓折騰成老實人，將懶漢打磨成勤民的磨盤」（mill to grind rogues honest, and idle men industrious），它也像英格蘭銀行一樣會支付股利。（*GT*: 126）

第四類語意以「satanic」為修飾語，指涉以政治經濟學為原則，包含道德改造機構、機器生產設施、自我調節市場在內的一整套社會制度：

19世紀工業革命的核心是生產工具不可思議的進步，伴隨的是

業資本主義仍以鄉村為主，並且需要工廠（mills）和勞工住宅區的地點」（*GT*: 188）。

¹³ 其他如：「憲章主義者為了阻止市場磨盤（the mill of the market）碾碎人們生活的權利而戰，但人民直到這個可怕的調適完成後才被賦予這個權利。在英格蘭內外，從麥考利（Macaulay）到米塞斯、從史賓塞到孫末楠（Sumner），好戰的自由主義者都表達了大眾民主危害資本主義的信念」（*GT*: 234）。

平民生活的災變性錯位 (catastrophic dislocation)。我們企圖釐清哪些因素導致了這種錯位的各種形式，就像英國在一個世紀前到達頂峰的那樣。怎樣的「撒旦磨坊」把人們碾碎成散眾 (What “satanic mill” ground men into masses?)？這在什麼程度上是由新的物質條件引起的？又在何種程度上是由根據新物質條件運轉的經濟依賴所造成的？透過怎樣的社會機制，舊的社會組織被破壞，而讓人與自然之重新整合的嘗試如此失敗？(GT: 35；黑體為作者強調)

毫無疑問，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市場對市場經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會哪怕只是片刻之間都無法承受這種赤裸裸虛構的體系所造成的影響。除非該社會的人類質體和自然質體以及商業組織，都能得到保護而對抗這個撒旦磨坊 (satanic mill) 的傷害。(GT: 76-77；黑體為作者強調)

正是這一整套制度，導致平民生活的「災變性錯位」。然而，為什麼是「錯位」而不是其他的失序樣態？¹⁴ 為什麼這種錯位是「災變性」的？

「Dislocation」這個詞彙描述《鉅變》嘗試解釋而歸咎於「撒旦磨坊」的社會後果（包括文化退化），在正文裡出現 33 次之多。若進一步檢視博蘭尼分析社會錯位的成因、機制和表現形式，以及不同社

¹⁴ 黃樹民譯（2017）的《鉅變》譯本根據脈絡而將「dislocation」譯為流離失所、秩序錯亂、動亂、變動、破壞、亂象、解體、變遷、混亂、騷動、崩潰、紛亂、錯亂、紊亂等。這些翻譯都有「不正常地偏離或脫離原有秩序和位置」之意，因此譯為「錯位」，雖無法適切涵蓋博蘭尼在不同脈絡下想表達的意涵，但目前沒想到更適切的譯法。

會階層或勢力對各種錯位形式的回應，《鉅變》裡「社會錯位」的具體指涉應為一般平民因伴隨市場經濟形成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遷，自傳統生活形式中剝離出來的生存境況。

首先，就社會成因來看，「19 世紀工業革命的核心是生產工具不可思議的進步，伴隨的是平民生活的災變性錯位」，「由機器引起的社會錯位以及人們處於為機器服務的境況，產生許多無可避免的後果」（*GT*: 35, 103）。但生產工具進步造成的社會錯位，是因有產階級以「憑藉信念的行動」（act of faith）回應生產工具的進步，包括以經濟自由主義展望國運，且以自我調節市場為國際貿易和社會的組織化原則，如：

希望——可完善性的願景（vision of perfectibility）——自人口規律和工資法則的夢魘中提煉出來，並體現為進步（progress）這概念，這概念是如此鼓舞人心，因而似乎能用來正當化未來承受巨大而痛苦的種種錯位。（*GT*: 88）

國際自由貿易不過是個憑藉信念的行動。……它意謂英格蘭的食物供給將仰賴海外來源；若有必要將犧牲農業而進入一種新的生活形式，英格蘭在這種生活形式下將是模糊構想之未來世界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英國將秉持對自己優越之創造發明和生產性能力的堅定信念，面對持續的產業錯位（industrial dislocations）前景。（*GT*: 144）

「憑藉信念的行動」包括種種追求純經濟進步的改良（improvement），而社會錯位則是代價：

1607年為貴族擬定的官方檔案，以「窮人的目標應得到滿足：居所；而仕紳們的渴望不應受到障礙：改良」(The poor man shall be satisfied in his end: Habitation; and the gentleman not hindered in his desire: Improvement) 揭開變更土地利用方式問題的序幕。這個陳述似將社會錯位為純經濟進步的代價視為理所當然，同時暗示悲劇的必然性。……規模遠超過圈地運動的社會錯位，像雪崩般驟然降臨歐洲；這場災變是經濟改良這個聲勢浩大運動的伴生物。……這個手段導致的錯位必將瓦解人的各種關係，且可能毀滅人的自然居住環境。(GT: 37, 42, 44)

由於「改良」的進程太過急遽，社會組織構造面臨驟變無法及時調適而造成各種形式的錯位，包括：貿易劇烈波動造成的陣發性勞動需求所帶動的區域性人口遷移，摧毀了傳統鄉村共同體的正常秩序（鄰里關係、社會地位改變、失業），導致城鄉既有產業和職業結構的失衡，摧毀食物和原料的生產能力而威脅國家安全；鄉村勞動者湧入工業城鎮成為工廠苦工，剝離文化制度和人類關係而造成文化退化；工業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棄物對自然居住環境的破壞（GT: 44, 76-79, 89-99, 135, 144）。這是因為自我調節市場這個人為的社會機制主導了人類及其自然環境的命運，甚至購買力總量和購買對象。然而，

因為「勞動力」這種所謂的商品無法任意擺弄、不加分別地使用，甚至棄置不用，而不會同時影響身為這種特殊商品載體的人類個體。這個體系處置一個人的勞動力時，也同時處置連結其上的人這個生理、心理和道德的實體。剝奪文化制度的保護性包圍，人類將因社會暴露的影響而淪喪；他們將因敗壞、退化、犯

罪和飢餓而死於劇烈的社會錯位。¹⁵ 自然化約成各種（生產）要素、鄰里關係和景觀受到破壞、河流污染、軍事安全受到威脅、食物和原料的生產能力被摧毀。（*GT*: 76）

最後，不同社會階層或勢力對社會錯位的回應——即保護性的反向運動——是社會面臨變遷之際常見的防衛行為（*GT*: 136, 190），除了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行動外（*GT*: 192, 224），還包括延緩變遷速度的社會立法（特別是史賓漢連法案）、¹⁶ 嘗試解決失業問題的各種思想和實驗（如貴格派思想家 John Bellers 及深受其影響的 Robert Owen）、¹⁷ 中央銀行旨在緩衝和分散信用貨幣風險的各種信貸運動（國內信貸供給的集中化、公開市場操作等），以及伴隨著引入市場制度的配套保護主義措施（像是社會立法和關稅等）（*GT*: 203, 204,

¹⁵ 這與歐陸勞動階級的歷史經驗形成明顯的反差，博蘭尼認為英國勞動階級之所以未能倖免於這個「文化災變」，是因為「英國的鄉村文明缺少歐陸那種後來發展出工業城鎮的城市環境。英國的新城鎮缺少定居的都市中產階級，沒有工匠和手藝人以及令人尊敬的小資產階級和城鎮居民這種核心，作為同化這些粗鄙勞動者的融合媒介」（*GT*: 103）。

¹⁶ 「必須樹立大壩以保護鄉村免於工資上漲洪流的衝擊。必須找到方法，使鄉村環境免於社會錯位、強化傳統權威、避免鄉村勞動力因外流而枯竭，並提高農業工資但不至於讓農場主負擔過重。這樣的設計就是《史賓漢連法案》」（*GT*: 98-99）。

¹⁷ 博蘭尼認為貴格派思想家 John Bellers 的《合作勞動事業芻議》（*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 of All Useful Trades and Husbandry*, 1695）簡要包含了自機器在現代社會產生的劇烈錯位首度出現以來，與這問題相關的解決方案的大部分提案：「這種合作勞動關係（college fellowship）將使勞動而不是貨幣成為衡量所有必需品的標準……。」它的設計是「所有應為彼此工作而無需救濟的有用行業……」，勞動券、自助與合作的連結具有重要意義。為數三百人的勞動者就可以自我維持，並為其基本生存共同工作，「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據此，基本生活所需和根據成果的報酬就結合起來（*GT*: 111）。

223)。

第三個關鍵字是出現逾 10 次的「habitation」，它是構成第三章標題的字彙（“Habitation versus Improvement”），是「災變性社會錯位」降臨前英國平民的社會境況，也是經濟改良的代價。中譯本譯解為生活空間（居所、居住環境、生活環境）或房宅的使用和所有權，雖然有語境的適切性，但難以聯繫到「文化退化」這個博蘭尼最關注的問題。如果社會錯位涉及伴隨傳統生活形式瓦解而來的文化退化，那麼「habitation」理應包含道德和精神層面。博蘭尼便以「荒蕪」（desolation）這個就政治經濟學文類有點突兀的詞彙，來描述道德與精神層面的社會錯位，如「勞動人民湧入新的荒蕪所在（new places of desolation）——所謂英格蘭的工業城鎮」（GT: 41），以及當時主導性的古典政治經濟學：

重點不是他真的嘗試後是否找到工作，而是除非他不想餓死就只得進入可憎的貧民習藝所，工資制度將會崩潰，從而讓社會陷入苦難和混亂。冷酷手段的墮落之處，在於為藉助飢餓效應製造毀滅威脅這個公然承認的目的而解放勞動者。這個作法讓我們理解為何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著作所講的給我們荒蕪的淒涼感受（dismal feeling of desolation）。（GT: 232-233；黑體為作者強調）

鄉村人口外流或耕地轉為牧場而導致鄉村「荒蕪」還說得通，但擁擠髒亂的工業城鎮怎會是個「荒蕪所在」？除非「desolation」就像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1）一樣，刻畫的是心靈荒蕪的精神境況。換言之，「habitation」是既有生活形式提供的存身處所和精神寄託，而災變性的社會錯位則導致了遷移流離、

居住惡劣和心靈荒蕪。這也呼應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將古典政治經濟學稱為「淒涼的科學」（dismal science）：¹⁸

無論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或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布雷克或卡萊爾，都確信人的形象（the very image of man）已為某個可怕的災難褻瀆了。比詩人和慈善家的痛苦怒吼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卻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瞥過這些景象的冷酷靜默，而他們的世俗沉淪哲學（philosophy of secular perdition）正是這些景象孕育出來的」。（*GT*: 103-104；黑體為作者強調）

根據對 mill、dislocation、habitation（以及 desolation）這幾個關

¹⁸ 卡萊爾的「dismal science」普遍譯為「憂鬱／悲觀／沉悶科學」，一般說法是因為「經濟學根據經濟法則的如實分析預測不願一廂情願或譁眾取寵的分析」，但卡萊爾最初提到「dismal」是批判馬爾薩斯根據其人口學原理提出的「預防性防治」措施「dreary、stolid、dismal」，而第一次提到「dismal science」是為奴隸制度辯護，批判支持廢除奴隸制度者在供需（法則）裡找到宇宙的秘密，並將人類管理者的責任縮限為不擾人的責任：

我應該說，這不像我們聽過的「快樂的科學」；不，這是個慘澹的、荒蕪的，事實上相當悲慘和惱人的科學；為彰顯其意，我們或可稱為淒涼的科學。（Not a “gay science”, I should say, like some we have heard of; no, a dreary, desolate and, indeed, quite abject and distressing one; what we might call, by way of eminence, the dismal science.）（Carlyle, 1853）

本文認為博蘭尼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在於其悲觀預測，反而是政治經濟學基於「人性的理性抽象」發展出來的烏托邦式的樂觀，對普通人經受的苦難無動於衷，因此至少就本文所詮釋的博蘭尼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脈絡來說，將之譯為「淒涼的科學」較為適切。

鍵字的文本內關聯性解讀，《鉅變》裡「撒旦磨坊」的具體指涉並不是以 Fred Block 為代表所理解的工業主義初期運用燃煤蒸汽動力、勞動條件惡劣的血汗工廠，而是指英國約自 1607 年土地改良——或更確切的 1795 年史賓漢連制度——以來迄 1834 年《新濟貧法》期間，統治階級旨在將土地和勞動力轉化為虛構商品以建立**競爭性勞動市場**的政策和制度；這整套制度機制透過對貧民習藝所外無業者的嚴酷懲罰和所內道德敗壞的泯滅人性制度，強迫貧民接受並適應市場法則要求的勞動紀律和生活形式。

即使對「撒旦磨坊」提出了新的詮釋，仍未回答《鉅變》與布雷克的關連。底下接著處理上文提到 Kari Polanyi-Levitt 指出的「布雷克的『陰沉撒旦磨坊』在英格蘭『翠綠歡愉土地』的面容和工業勞動階級心靈上留下的傷痕」這個重要的互文性線索。

四、布雷克的「陰沉撒旦磨坊」：理性國度的浪漫主義神學批判

「撒旦磨坊」首度出現在布雷克史詩作品《米爾頓》（*Milton: A Poem*, 1810）〈序言〉裡的短詩：¹⁹

古早時的那些步履，

¹⁹ 文中所引述的布雷克詩作，原文主要依據 *The Complete Poetry & Prose of William Blake* (Blake, 1988)，譯文主要參考楊苡譯《天真與經驗之歌》（2012）及張熾恆譯《布雷克詩選》（2007）的翻譯，並根據作者理解修改而成。

踏上了英格蘭的蒼翠群山：

上帝的聖潔羔羊，
現蹤英格蘭的歡愉牧場！

造物主的慈顏是否，
照耀過雲霧繚繞的丘陵？
聖城耶路撒冷是否，
就建在此地陰沉的撒旦磨坊之間？

拿我的熾金之弓來；
拿我的渴望之箭來；
取來我的長矛：噢 雲層退散！
登上我的火焰戰車！

直到聖城耶路撒冷
在英格蘭翠綠歡愉的土地上建成之前：
我不會停止精神鬥爭，
不讓長劍沉睡手中。

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民 11: 29)²⁰

²⁰〈序言〉包含兩段文字和這首詩，並以引自《聖經·民數記》的句子結尾。這句子的脈絡是耶和華指示摩西召集以色列長老，要將降於摩西身上的靈分賜他們，讓他們與摩西同擔管理百姓的責任。助手向摩西反應有未響應召集的長老在行預言，希望摩西禁止他們，摩西說：「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民 11: 29)。該句雖不屬這首詩的詩行，卻是這首詩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本文引述的中、英文《聖經》版本分別為《聖經和合本》(聖經公會)及 The 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KJV)。

「陰沉撒旦磨坊」確有實指，即 1786 年竣工、英國第一座採用蒸汽動力的英格蘭製粉廠（Albion Flour Mills）。英格蘭製粉廠座落在倫敦黑衣修士橋東南，可 24 小時運作，每週生產 6,000 蒲式耳的麵粉，對當時倫敦地區相關產業造成災難性的衝擊。1791 年毀於大火時，生計曾受衝擊的民眾歡欣鼓舞，如報紙上出現題為〈麵包師傅的榮耀，就是大火〉（“The Baker’s Glory, Or, The Conflagration”，作者不詳）的打油詩，最後一句是「這會讓其他磨坊有更多工作」；²¹ 另有兩張當時的諷刺漫畫，很直觀地呈現英格蘭製粉廠的「撒旦磨坊」意象：其一是出版商兼插畫家 Samuel William Fores 所繪的諷刺漫畫，標題是〈窮人的篝火，也是敗露的英格蘭之恥〉（“A Bon Fire for the Poor or the Shame of Albion Exposed”，1791），畫面上幾處可見火焰間的魔鬼。²² 其二是藝術家 Samuel Collings 刊在 *Attic Miscellany* 雜誌上的版畫，標題是〈大火！或歡樂的雜糧粉商人〉（“Conflagration! Or the Merry Mealmongers”，1791），接著的說明文字是「1791 年 3 月 2 日黑衣修士劇場演出的舞蹈，博得滿堂彩」，畫面上的主角是雜糧麵包商、傳統磨坊主和諷刺畫報商販。²³

這場大火後的 18 年間焚毀的製粉廠都處於廢墟狀態，而這段期間正是自小居住在倫敦的布雷克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陰沉撒旦磨坊」象徵英格蘭製粉廠，但意涵當然不限於這座製粉廠。普遍的詮釋是將「陰沉撒旦磨坊」與「聖城耶路撒冷」對立，隱喻工業革命對自

²¹ “The Baker’s Glory, or, the Conflagration” (museum number 1868,0808.6017),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https://bit.ly/2MWODZj>

²² “Bon Fire for the Poor or the Shame of Albion Exposed” (museum number 1868,0808.6030),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https://bit.ly/361ULHw>

²³ “Conflagration! or the Merry Mealmongers” (museum number 1880,1113.1491),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https://bit.ly/2N9VsWi>

然和人類關係的破壞，但更具體的象徵意義則包括工業廠房、（宣揚恐懼和謙卑的）正統教會，以及（創造理性主義知識體系的）大學。本文傾向於認為「撒旦磨坊」的完整意義同時包含這三個意涵，象徵理性知識支配的社會制度。

布雷克完成於 1789 至 1794 年間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1789)、《經驗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 1794) 及之後的詩作，由於精神上的一致性，成為詮釋「陰沉撒旦磨坊」的重要文本。其中，《經驗之歌》裡的〈倫敦〉(“London”)：

我漫步每條特許的街道，
鄰近特許的泰晤士河水流。
每個遇見的臉孔上我看到
虛弱的痕跡和悲苦的印記。

在每個人的每次呼喊，
每個嬰孩恐懼的哭聲，
每個聲音和禁令中，
我聽到心靈鍛造的鐐銬

掃煙囪小孩的哭聲
讓發黑的教堂膽顫心寒，
不幸士兵的悲嘆
血淌流下皇宮高牆

午夜街道上最常聽到
年輕妓女的詛咒

嚇哭了新生的嬰兒
讓婚姻靈床染疫枯霉

〈倫敦〉由於批判性地揭露工業主義初期底層勞動者悲慘的社會境況，也啟發不少馬克思主義式的解讀（如 Vice, 1993）。

布雷克從種種悲慘境況的呼喊中聽到的「心靈鍛造的鐐銬」（The mind-forg'd manacles），在其他詩裡則是「人類腦袋裡紮根茁壯的毒樹」，象徵人類對同伴的負面情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道德退化？《天真之歌》的〈神性形象〉（“The Divine Image”）與《經驗之歌》的〈神學形象〉（“A Divine Image”）之間的對比正好是人類道德退化前後的寫照，而〈人性抽象〉（“The Human Abstract”）則為這種退化提供解釋。在〈神性形象〉裡，²⁴

仁慈、悲憫、和平與愛，
是眾人在苦難中的祈求：
這些令人愉悅的美德
回報感謝。

仁慈、悲憫、和平與愛
是天主，我們親愛的父：
而仁慈、悲憫、和平與愛，
是人，祂的孩子和關注的人。

²⁴ “The Divine Image”和“A Divine Image”裡的「divine」，前者指上帝的形象，故譯為「神性形象」，後者是來自教會宣揚的帶著原罪的人的形象，故譯為「神學形象」。

因為仁慈有類人的心，
悲憫，有張人的面容：
愛，有個神性的人類形體，
而和平，有身人的衣裝。

所以每個地方的每個人，
在困苦中祈禱，
都向著人的神性形體
仁慈、悲憫、和平與愛。

眾人均須愛人的形體，
異教徒、土耳其人或猶太人。
哪裡有仁慈、悲憫、和平與愛，
哪裡就有天主

布雷克認為人類在苦難中對上帝祈求仁慈、悲憫、和平與愛，其實是祈求人心的這些美德，都指向上帝這個「神性的人類形體」，因而依上帝形象受造的人類，無論出身什麼種族或信奉哪種宗教都應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然而，在〈神學形象〉裡，

殘酷有類人心
嫉妒有張人臉
恐怖，有神聖的人形
而詭秘，有身人的衣裝

人的衣裝，是鍛造的鐵

人的形體，是熾烈的鍛爐，
人的面容，是密封的爐膛，
人的心，是難填的溝壑。

殘酷、嫉妒、恐怖和詭秘都是人類心靈滋長出來、脫離人就失去現實性的抽象概念。人類心生貪婪嫉妒、隱密籌劃、製造恐怖，因而既剛硬如鐵失去溫和柔軟，卻也像鍛爐般擁有破壞性和建設性的強大潛能。布雷克將這樣的人性退化歸咎於「抽象概念組成的人性形象」。在〈人性抽象〉(“The Human Abstract”)裡：

不再有憐憫，
若我們不讓人們成為窮人：
也可以不再有慈悲，
若所有人和我們一樣幸福；

互相懼怕帶來和平；
直到自私的愛增長。
接著殘酷織就一張羅網，
撒出關懷的誘餌。

他帶著敬畏坐在那裡，
淚水淌滿一地：
於是謙卑牢固生根
在他的腳下。

迅即奧跡的陰沉暗影

降臨他的頭上；
而毛蟲和蒼蠅，
以臭跡為食。

它結出欺騙的果實，
紅潤且甜美可口；
而渡鴉已築巢
在最濃密的樹蔭裡。
陸地和海洋的諸神，
翻遍世界尋找這棵樹；
但祂們的搜索終歸徒勞，
因為樹已在人腦裡生根茁壯。

布雷克認為，有了貧困和不平等才有憐憫，無法所有人都獲得幸福才有慈悲，而和平則來自基於自私之愛的互相恐懼；人類對上帝懷抱的敬畏和懼怕，心生謙卑並以之建立信仰的知識，這棵扎根人心的知識之樹供養著蟲蠅般的神職人員，像結果實一樣造出「救贖」這種惑人的謊言。〈人性抽象〉描述了人類心靈成為自身墮落的動因：因為傳統基督教慈悲和憐憫的美德預設一個貧窮和苦難的世界，但人們更願從憐憫和施捨中獲得道德優越感，沒有意願改變憐憫施捨對象處境；然而，藉助這些抽象概念的推論和道德化思考，人們將自己真實的情感和動機，特別自身對同類造成的苦難合理化。顯然「抽象概念組成的人性形象」是個關鍵，但揭開這個關鍵與「撒旦磨坊」的關聯需要兩個參照點，一是基督教關於人的概念，一是布雷克獨特的神學思想。

首先，基督教關於人的概念與原罪觀念緊密相連，而與天主教的重要區別是「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教義。根據《舊約》所載：「神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並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賦予治理之責」(創 1: 27-28)，但亞當與夏娃受撒旦誘惑偷嚐能夠分別善惡的果實，得罪上帝而離開伊甸園後，不再享有與神同在的權利，人類也因始祖亞當和夏娃的罪而生活艱困流離。但人類離開上帝的國度後，從信靠上帝轉為相信自己、從敬虔到褻瀆、從謙卑到僭越，沉溺罪惡而招致上帝降下大洪水(Cataclysm)的懲罰。²⁵後來上帝基於慈愛憐憫，帶領猶太人離開埃及並頒下十誡律法。但人類還是未善盡交付的管理之責，且不遵守神所頒布的律法，讓世界日漸墮落毀壞，因而有了古代先知奔走呼喊上帝重新掌權施恩的救贖盼望(遠志明，2001，頁 50-51)。根據「因信稱義」的教義，神的恩典再度啟動救贖計畫，而基督耶穌是計畫執行者，目的是讓人可以獲得完全的罪的赦免，甚至免於滅亡而獲得永生。而獲得赦罪稱義的唯一方法就是存著真實的信心悔改認罪，懇求主耶穌的寶血洗淨一切的罪，懇求主的聖靈潔淨更新心靈，從心裡恨惡並離棄一切的罪。這是一般基督新教的核心思想，也是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國教會(Anglicanism)的核心教義。

然而，布雷克不完全接受這套教義。布雷克的詩作和繪畫之所以晦澀解難，原因之一是留下的生平資料太少而缺乏足夠的解讀線索。Thompson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裡關注基進的反國教者

²⁵ 「Cataclysm」 衍自希臘文「kataklysmos」，在《新約》裡特指諾亞時代的大洪水：世人墮落而不關注上帝，經多次警告卻不悔悟，上帝降下大洪水毀滅除了方舟上的諾亞一家和動物以外的所有活物。耶穌也曾以大洪水為例，警告人們末日的到來(馬太 24: 37-39；路加 17: 26-27)。

(Radical Dissent)，認為他們的信仰、社會結構和政治之中藏著「政治基進主義的蟄伏種籽，一旦落在有益和充滿希望的社會脈絡中就會發芽」(1968: 39)。Thompson (1993) 取得馬革頓教派 (Muggletonism) 檔案資料後，抽絲剝繭，嘗試從「因信稱義」和反律法主義的視角，重建布雷克的基進政治思想。他認為 18 世紀末橫掃英格蘭的福音復興運動 (evangelical revival) 源於反國教的政治基進主義傳統，嘗試從反律法主義 (antinomianism) 尋找布雷克政治基進主義的根源 (Boer, 2009)。Thompson 認為，布雷克의思想和藝術作品裡都看得到反律法主義傾向，但反律法主義只提供布雷克思維結構、格調、教義和象徵，他的獨特之處源自馬革頓教派這個更古老的反國教傳統。這個教派的特色是對權威抱有敵意、反教權主義、信仰「因信稱義」但強調基督的慈愛寬恕，且善於運用象徵 (1993: 18, 101)。馬革頓教派相信，「世上沒有上帝，只有榮耀的凡人耶穌基督」(there is no God but the glorified Man Christ Jesus) 且「世上沒有魔鬼，只有人類不潔的理性」(there is no Devil but the unclean Reason of men)。²⁶

根據 Thompson 的詮釋，馬革頓派教義對布雷克的影響體現於「樹」、「墮落」和「獸」的象徵意義上。首先，「樹」或者代表知識，馬革頓派的信仰若不是鼓勵單純的反啟蒙主義，就是捍衛想像力或情感，以對抗統治階級優雅文化的「理性」；「樹」也代表分別善惡

²⁶ 見 Wikipedia (2019) “Muggletonianism”。由於馬革頓教派避免所有形式的崇拜或傳道，且僅為了討論和社交而聚會，對該派教義和活動的理解很少，直到可能是該教派最後一個教徒 Philip Noakes 保管的整個教派檔案在他 1979 年過世後捐給大英圖書館，才得到比較系統性的研究。此處的討論主要根據 E. P. Thompson 關於布雷克獨特馬革頓教派神學思想的研究且聚焦於與本文旨趣相關的部分。

的知識，象徵與赦罪的福音和愛相對立的道德法和道德主義。其次，馬革頓教派對「墮落」有獨特理解：魔鬼誘惑夏娃，讓自己轉移到夏娃子宮內而進入人性，成為「理性」的抽象化和道德化能力。最後，「獸」在《啟示錄》裡象徵「反基督者」，獸的王國（kingdom of the Beast）則象徵壓迫性的教會和國家機器。Thompson 總結道：布雷克的思想 and 藝術或許離奇古怪且頗多矛盾不一致，但有個源自反律法主義傳統的思想始終一貫：基進的反霸權立場、反對統治階級的優雅文化、敵視道德法；他持續以藝術實踐對抗此岸之國的反基督者（the Beast of the State），從未屈服於撒旦王國（Satan's Kingdom）（Thompson, 1993: 222-223, 228-229）。

在布雷克那裡，撒旦是個無法接受神光的永恆死亡之國，而不是一種人類存在（human existence）；撒旦是此岸的君王和神明，在政治體制上熱衷戰爭而敵視自由，在個人身上則是自私的原則和理性化的能力（Damon, 1965: 355-358, 385-388）。循著馬革頓教派這個反律法主義傳統對基督教人性概念的理解，「陰沉撒旦磨坊」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涵。人按上帝形體受造而同有神性形象，但藉著「人性抽象」——包括體現為統治階級優雅文化之「理性」的抽象化和道德化能力和教會宣揚的敬畏謙卑——而轉化為帶著原罪的「神學形象」：透過憐憫、慈悲、和平、謙卑等抽象概念組成的人性形象，人類自我蒙蔽了道德感、優越感、自私、恐懼這些行為背後的真實動機，並滋長出殘酷、嫉妒、恐怖、詭秘等情感，無視自身為同伴帶來的苦難。這個抽象概念組成的人性形象剛硬難摧，正如「心靈鍛造的鐐銬」。如果聖城耶路撒冷意味著上帝重掌權柄的世界，那布雷克筆下〈倫敦〉裡描繪的慘狀，不就是人類受「心靈鍛造的鐐銬」牢牢拘束的「陰沉撒旦磨坊」？不正是背離上帝而讓化身理性的撒旦掌握權柄的心靈荒

場？

底下接著說明：正是這個意義的「撒旦磨坊」，在英格蘭「翠綠歡愉土地」的面容和工業勞動階級心靈上留下傷疤，並深深地烙在博蘭尼的意識裡。如此詮釋才能——正如博蘭尼女兒堅信的——理解《鉅變》裡大量宗教性隱喻的修辭和控訴有產階級「為改良犧牲安居」那些文字裡的激情。

五、布雷克視角下的《鉅變》

循著「布雷克的『陰沉撒旦磨坊』在英格蘭『翠綠歡愉土地』的面容和工業勞動階級心靈上留下的傷痕，深深烙在博蘭尼的意識裡」這條線索，我們或可在布雷克的「陰沉撒旦磨坊即人類以撒旦化身的理性為居所」與博蘭尼「撒旦磨坊是將勞動力轉化為受競爭性勞動市場調節的虛構商品的一整套社會制度」之間，看到某種浪漫主義神學的延續性：²⁷ 撒旦化身為人類的理性，崇拜理性就是以撒旦為居所。換句話說，自我調節市場的興起對西方社會而言是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神學事件：勞動成為彷彿為物的虛構商品褻瀆了人類按上帝形象受造的「神性形象」，這得力於古典政治經濟學鼓吹的理性經濟人形象、倡議奉市場法則這種物的法則為社會主宰、宣揚棄絕宗教救贖投入世俗沉淪的功利主義。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博蘭尼批判馬爾薩斯和李嘉圖

²⁷ 浪漫主義神學 (romantic theology) 是英國詩人神學家 Charles Williams 提出的概念，指的不是對神學抱持浪漫情懷，而是對浪漫傳奇抱持神學態度 (theological about romance)，強調各種浪漫傳奇經驗裡神學意涵 (Lewis, 1947)。

的政治經濟學是「世俗沉淪哲學」：

人類被迫讓自己投身世俗沉淪：認為人類不是停止繁衍種族，就是有意藉著戰爭和瘟疫、飢餓和罪惡造成的滅絕來懲罰自己。社會存在貧困是天經地義；當財富無限增加的許諾落空時，食物有限和人口無限已成了問題，這讓諷刺更為苦澀。（*GT: 88*）

《鉅變》第10章〈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集中討論了這種「世俗沉淪哲學」的唯經濟論謬誤（economistic fallacy）。博蘭尼認為，經濟過程結合複雜多樣的社會動機，透過市場交換（market exchange）、互惠（reciprocity）、重分配（redistribution）等整合形式，並以市場、對稱結構（symmetry）和中心性（centricity）等制度模式為支撐而達致統整和穩定，但各種唯經濟論卻將經濟窄化為獲利動機、市場交換和市場制度模式的三位一體。在〈我們過時的市場心態——文明必須找到一種新的思維模式〉（“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Our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1947）裡，博蘭尼提出二戰後西方社會的處境：如果社會要繼續生存而我們也不想放棄逐漸完善的物質環境，就必須解決「如何組織人類生活以適應機器社會」的問題。完成這個任務要求一種思想的自由，但我們卻因市場經濟遺害而缺少這種自由；這個遺害就是：為了大規模使用複雜強大的機器來追求物質繁榮，我們將人類經濟轉為一個由諸市場構成的自我調節系統，並以這種獨特的創新為模澆鑄我們的思想和價值。自我調節市場和經濟動機這兩個僅在市場經濟下方為真的主張，卻被看成永恆的真理，因而需要意識改革才能克服這種箝制心智而倍增適應難度的原教旨異端。

博蘭尼認為，以自我調節市場為組織化原則的社會，關鍵的發展是勞動和土地轉化為虛構商品，從而將人和自然的命運託付給自我調節市場。自我調節市場的驅動力是饑餓和獲利，而「經濟動機」支配著經濟領域，個體在市場的蹂躪下只能出於經濟動機行動；「被迫改宗皈依某種功利主義觀點，致命地扭曲了西方人對自己的理解」（Polanyi, 1947: 111）。博蘭尼強調，沒什麼人的動機本身是經濟的，也不存在自成一類的經濟經驗，但因賺取收入的需要，饑餓和獲利與生產連結起來而成為所有經濟系統仰賴的唯一誘因。但這個假設缺乏根據，因為人是社會動物而非經濟動物，各種行為目標的誘因都具有混合的特徵；人類經濟從浸沒於社會關係中轉為受自我調節市場控制，是個全新的發展：

直到大概一個世紀前，勞動的自由市場才在英格蘭誕生。惡名昭彰的《新濟貧法》（1834）廢除了家長式政府給貧民的粗陋救濟。貧民習藝所從窮困者的避難所變成充滿恥辱精神折磨的處所，比饑餓和悲慘更難忍受。但窮人捨此之外只能選擇餓死或工作，於是一個競爭性的全國勞動市場就這樣創造出來了。（Polanyi, 1947: 113）

此後十年內，《銀行法案》（1844）建立了金本位制度，土地法的改革讓土地流動起來，而《穀物法》的廢除（1846）也創造了一個世界穀倉。由此建立了經濟自由主義的三大教旨，成為市場經濟賴以建立的原則：

勞動應該在市場上找到它的價格；貨幣應該由一個自我調節的機

制供給；商品應該在不同國家自由流動，而不管這樣會帶來怎樣的後果；簡言之，即勞動市場、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貿易。由此導致一個自我煽動的進程，結果就是先前無害的市場模式擴張成一種社會學罪行。（Polanyi, 1947: 113）

博蘭尼指出，雖然「經濟動機」不是人們工作的唯一誘因，但我們只關注假定的動機和企業的意識形態，並據此形成對人性的看法，後果則是：一旦社會期待成員某種明確的行為，且主流制度大致能貫徹那種行為，那麼對人性的主張就傾向於反映出這種想法。正是因為這種自由放任哲學、世俗沉淪哲學或新的人性概念，人類的生命統一體被撕裂成一個服從物質價值的「真實的」人和一個「空想的」更好的自己，這多少無意識地助長了「經濟決定論」的偏見，從而麻痺了我們的社會想像力。博蘭尼呼籲回復那些在日常活動中影響生產者的各種動機的統一、將經濟系統重新吸納到社會之中，並創造性地調整生活方式以適應工業環境（Polanyi, 1947: 115-116）。

接著在〈經濟是嵌置的過程〉（“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1968/1957）裡，博蘭尼以「實質經濟 vs. 形式經濟學」的區別，闡明「形式經濟學」就什麼意義而言體現了這種「市場心態」：

「(E)conomic」之實質意義源於人類生活對自然和同伴的依賴。它指人與其自然和社會環境之間的互相轉換（interchange），進而提供人類滿足物質慾望的手段。「economic」之形式意義源於手段—目的（means-ends）關係的邏輯特性，常見於「簡約的」（economical）或「節約的」（economizing）這類詞語。它指的是這樣一個明確的選擇情境，亦即因為手段不足而造成要在手段

的不同用途之間進行選擇。如果我們把決定手段選擇的規則稱為理性行動 (rational action) 的邏輯，則或可用個權宜的術語來指稱這個邏輯變體，即形式經濟學 (formal economics)。(Polanyi, 1968/1957: 139-140)

形式意義源自邏輯，指在不充分手段的不同用途間進行選擇的一組規則，是心靈的法則；而實質意義源自事實，指的既不是選擇也不是手段的不足，因人的生計不見得涉及選擇，即使存在選擇，也未必是受限於手段的稀缺，這是自然的法則。「Economic」這兩種根本意義，就語意而言相反且毫無共通之處。但由於近兩個世紀以來西歐和北美出現一種定價市場體系 (system of price-making markets) 所支配的經濟型態，格外適用以形式意義為基礎的方法，「economic」之形式與實質意義才得以相符 (Polanyi, 1968/1957: 141)。

根據前述布雷克浪漫主義神學的視角，《鉅變》裡「撒旦磨坊」的第二層意涵可以重新詮釋如下：將土地和勞動轉化為虛構商品的一整套社會制度，其正當性是「僅根據經濟動機行動」的理性人預設，這種抽象的人性概念迥異於且悖離人類按上帝形象受造因而應彼此相愛的「神性形象」。這種人類形象的置換，加上關於經濟的狹隘觀念，合理化人類將社會和自然的命運交付不屬於人定法的邏輯法則支配。這是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神學事件：以上帝形象受造而個別皆具獨特價值的人，透過特定社會制度而被降格為不是為了出售而生產卻具有市場價格的物品。前市場社會的人們在穩定的生活形式中安身立命，但新興的政治經濟學這種以抽象的人性預設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形式經濟學，則倡議透過一系列理性的社會制度——亦即以撒旦化身為理性的主宰——破壞傳統生活形式而讓平民置身以自我調節市場為組

織化原則的社會處境，結果便是災變性的社會錯位。

通過對自我調節市場興起過程中「人的形象」的互文性分析，博蘭尼賡續了布雷克對工業主義文明的批判：19世紀災難性的社會錯位是人類「以化身理性之撒旦為居所」所造成的社會災難。這就不難理解《鉅變》原本的書名其實是《大災變（大洪水）的起源》（*Origins of the Cataclysm*）（Adlemen, 2017）。

六、定位《鉅變》的獨特性

是否可以根據「撒旦磨坊」的政治經濟學和浪漫主義神學意涵——將土地和勞動轉化為虛構商品的整套社會制度，以及這套社會制度以之為正當性基礎的人性概念——重新評價和定位《鉅變》？底下以馬克思論原始積累、韋伯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傅柯論圓形監獄和全景敞視主義為參照點，嘗試在現代性批判的光譜中定位博蘭尼理論的獨特性。

首先，博蘭尼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除了窄化人類動機的唯經濟謬誤，以及堅持資本主義的主要罪惡是文化退化而不僅是經濟剝削外，就本文論點涉及的主要是關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不同理解。馬克思認為，創造資本關係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包括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以及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2017/1867，頁 687-689）。以英國為例：

這個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不可能像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廠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適應新狀態的紀律。他們大批地變成了乞丐、盜賊、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於習性，但大多數是為環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紀末和整個十六世紀，整個西歐都頒佈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於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於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馬克思，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2017，頁 705-706、708；黑體為作者強調）

然而，單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並不會自動讓工人階級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當然。要維持工人對資本的常態性從屬，有賴於非經濟性的社會機制和有組織的暴力：

在通常的情況下，可以讓工人由「生產的自然規律」去支配，即由他對資本的從屬性去支配，這種從屬性由生產條件本身產生，得到這些條件的保證並由它們永久維持下去。在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情況則不同。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制地限制在有利於賺錢的界限內，為了延長工作日並使工人本身處於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就需要並運用了國家權力。這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馬克思，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2019，頁 708）

對於國家權力在這過程中的角色，「撒旦磨坊」提供了不同的

視角：馬克思強調的是諸如鞭打、烙印、酷刑等制度化人身暴力（physical violence），而博蘭尼強調的則是制度化的道德暴力（moral violence）或借用 Avishai Margalit（1998）的概念——制度性的羞辱或剝奪人性（institutional humiliation or dehumanization）：

貧民習藝所從窮困者的避難所，變成了充滿恥辱和精神折磨的處所，比饑餓和悲慘更難忍受。捨此以外，窮人只能選擇餓死或工作，於是一個競爭性的全國勞動市場就這樣創造出來了。（Polanyi, 1947: 113；黑體為作者強調）

對博蘭尼來說，濟貧制度的「制度性羞辱」對市場經濟的確立有重大意義，因為市場經濟的社會前提是勞動成為虛構商品，而勞動成為虛構商品的前提除了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馬克思），同樣重要但馬克思視為次要的是貧民被剝離既有文化制度和社會關係，並透過環繞著習藝所內充滿恥辱和精神折磨的機構處境，貧民才被迫接受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若不至於造成過度化約和簡化的解讀，或許可以用馬克思風格的修辭來凸顯博蘭尼的強調：市場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只不過是貧民被剝離既有文化制度和社會關係的歷史過程，而對他們的這種剝離的歷史是用道德烙印和精神折磨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這個「市場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也同韋伯的論點形成顯著對照。如果韋伯強調宗教救贖的教義如何成為生活導引而具有經濟史的重要意義，那麼博蘭尼則是強調宗教關於人的概念如何成為社會對自己作用的依據而具有不同的經濟史意義。在〈比較宗教學導論——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韋伯，康樂、簡惠美譯，1989/1895）裡，韋

伯指出：

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於『理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常如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人們希望「自何處」被拯救出來，希望被解救到「何處去」，以及——讓我們也別忘了——「要如何」才能被拯救，這些問題的解答全在**個人的世界圖像**。（康樂、簡惠美譯，1989/1895，頁 71；黑體為作者強調）

韋伯關注「天職說」和「預選說」所形塑的個人世界圖像如何影響新教徒的經濟行為，但博蘭尼關注的是基督教關於人的概念及其如何影響社會群體間的權利義務，特別是關於人的概念的轉變——強調個體獨特性（the uniqueness of the individual）和人類獨一性（the oneness of mankind）的「神性形像」轉為恐懼飢餓追求利益極大化的理性經濟人這種「神學形象」——如何對不同社會階層成員產生怎樣的差別影響，因而提出一種有別於韋伯的比較宗教學視角：宗教關於人的概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如何影響軌道轉轍器的差別化設計，從而讓不同階層的人通往不同命運。²⁸

第三，傅柯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1995/1975）裡藉著邊沁設計的圓形監獄闡明新的權力形式：圓形監獄是以中央監視塔為中心環繞著分割成個別囚室的環形建築，中央監視塔正對著個

²⁸ 博蘭尼的著作裡有多處引述韋伯，但主要是當成原始和古代經濟的經濟史證據（*GT*: 281-283），以及對韋伯結合經濟的實質之形式意義的經濟史取徑的質疑（Polanyi et al., 1957: 135-138）。

別囚室而對囚禁者而強加一種軸向的可見性和橫向的不可見性，這種安排給囚禁者引入一種確保權力自動運作之有意識和持續的可見性狀態，進而無意識地從這種虛構的關係中產生真實的從屬：

從屬於這個可見性領域並知道這個事實的人，承擔了權力約束的責任；他讓這種約束自動地在自己身上運作；他將自己同時扮演兩種角色的權力關係銘刻在自身上；他成了自身從屬的原則。

（Foucault, 1995/1975: 202-203）

傅柯關注圓形監獄的空間佈署策略對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技術這種新權力形式的歷史意義，而博蘭尼關注的是包括貧民習藝所和圓形監獄的設施機構如何「把流氓折騰成老實人，將懶漢打磨成勤民的磨盤」（*GT*: 126）以「利用窮人勞動產生利潤以支付股利」的道德改造作用；這種機構設施的作用在於特意營造出一種與死亡同樣難以承受的道德境況，迫使貧民在餓死與徹底喪失人性尊嚴的機構生活之外尋找出路，進而屈從於競爭性勞動市場要求的紀律。²⁹

以馬克思、韋伯和傅柯為參照點，博蘭尼對市場資本主義的剖析可以概述如下：市場資本主義興起的社會前提是無產者成為虛構商品

²⁹ 就與本文處理議題涉及的範圍來說，貧民習藝至少有四個功能：一是貧民救濟的機構，這是主流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觀點；二是「鎮壓性國家機器部門」的附屬機構，逼迫貧民必須在「殘酷的習藝所」與「進入勞動力市場」之間二擇一，從而促成了勞動力市場的興起，這是馬克思的強調；三是以「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的方式透過全面、全時地管制收容者生活細節，強加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紀律的規訓機構，這是傅柯的強調；四是逼迫貧民必須在「道德退化的習藝所」與「進入勞動力市場」之間二擇一的道德與意識改造機構，這是本文宣稱的博蘭尼的強調。這些功能的區別感謝審查人之一的提醒。

並適應競爭性勞動市場所必需的紀律，這個社會前提的創造涉及超經濟的手段，除了國家機器強加的制度化人身暴力外，也仰賴以道德和意識改造為目的的制度性羞辱。這個歷史過程，無異於西方社會的全面性改宗皈依，因為勞動成為虛構商品這種人性抽象和人的物化，合理化、差別化了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權利關係和道德義務。

七、結語：朝向新博蘭尼取徑？

由於《鉅變》引述不足（undercitation）的寫作風格，以及布雷克作品的晦澀難解和詮釋彈性，僅憑「撒旦磨坊」的互文性關聯和博蘭尼女兒的回憶等薄弱線索，並根據大量間接的文本證據、不充分的論據和大膽聯想，便對《鉅變》提出與普遍接受的見解相當不同的重新解讀，這是本文論證的最大缺陷。但若這個大膽的嘗試能拋磚引玉，刺激更多重新發現甚至拓展博蘭尼理論的嘗試，將是本文的最大貢獻。從這個角度出發，最後根據本文提出的論點進一步引申，作為總結。

本文以「撒旦磨坊」這個《鉅變》裡未受足夠重視的標題為切入點，嘗試發掘《鉅變》迄今被忽略的重要意涵。根據對《鉅變》裡幾個關鍵字的文本內關聯性分析，「撒旦磨坊」最完整的意義應是包括濟貧制度和相關機構設施在內的一整套以道德改造為目的、旨在將貧民打造成虛構商品並適應競爭性勞動市場所需紀律的制度機制。接著透過與布雷克「陰沉撒旦磨坊」的互文性分析，指出將貧民打造成虛構商品並適應競爭性勞動市場所需紀律的這套制度機制，其正當性的基礎是與傳統基督教「人按上帝形象受造」因而應彼此相愛的神性形

象相悖離的「神學形象」——理性的經濟人。這個以抽象的人性預設為基礎的經濟自由主義，倡議將社會和自然的命運交付屬於物的法則的市場規律支配，正是「撒旦磨坊」——以撒旦化身的理性為主宰——的浪漫主義神學意涵。

作為制度正當性基礎的特定人性概念、藉助制度性羞辱實現意識改造的社會機制，以及與特定制度秩序相適應的生活形式，或可成為一個博蘭尼取徑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聚焦於同時是生命體的法律主體且在人口的層次上治理生命過程（Lemke, 2011: 4）——理論的基本要素。首先，《鉅變》凸顯了基督教關於人的概念在市場資本主義發產初期歷經的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在宗教史和經濟史的重要意義。從布雷克浪漫主義神學的視角來看，人的神性形象從而人的價值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這是西方傳統社會制度正當性的重要來源。但市場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基礎，根據經濟自由主義是「按經濟動機行動的理性人」這種人性預設，這意味著新經濟制度或社會秩序的創建需要以之為正當性基礎的「人性抽象」，據以重新定義和組織新的社會關係和權利義務。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後基因體時代、數位時代或人工智慧時代相應的經濟技術體制，都要求相適應的「人性抽象」。如 Nikolas Rose（2006）所言，分子操控（molecular manipulation）是我們社會的重要特徵：

當代生物醫學的「思維風格」將生命看成在分子的層次上一群可理解的生命機制，能夠在不受自然生命秩序之明顯規範性所侷限的干預實作中加以辨識、析離、操控、調動和重新組合。（Rose, 2006: 9）

這種生物醫學的人性抽象，賦予國家機器和醫療專業以人群健康之名強制醫療介入的正當性，並為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創造必要的社會文化前提。博蘭尼取徑的切入點或許能對範圍日益深廣的社會醫療化現象提出不一樣的洞察。

其次，博蘭尼認為要讓勞動成為虛構商品並適應市場資本主義要求的紀律，單憑直接暴力不足以竟其功，仍需經過道德和意識改造才能讓勞動階級自動遵循生產或市場的「自然規律」；加上這個博蘭尼補充或許才是「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的完整意義。博蘭尼敏銳地察覺到英國伴隨市場經濟興起的濟貧制度和機構設施，如何透過系統性、例行性的踐踏人性尊嚴營造出不可承受的道德境況，讓貧民別無選擇而消極接受新經濟體系要求的紀律。這種藉著歧視、貶抑、損害尊嚴、剝奪權利和歸屬感等制度性羞辱，給特定族群造成心理傷害以改變目標對象行為或推動社會變遷，對於新制度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Margalit (1998: 1) 說：「在文明社會中，社會成員互不羞辱，在正派社會裡，制度不羞辱人。」頗能呼應博蘭尼的洞見和批判。

第三，博蘭尼並未盲目地反對理性或進步，而是認為過於劇烈的社會變遷將造成災變性的社會錯位，因為人類作為社會存有就其現實性而言是生活形式的總和，而市場經濟的運作要求將人從傳統生活形式仰賴的社會關係和文化制度中剝離出來。就這個意義而言，「生活形式」(form of life) 一詞掌握了經濟脫嵌導致社會錯位的關鍵。建制民族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以剝離經驗 (disjuncture) 為切入點，考察支配性的社會關係如何透過以文本為中介的跨地性活動協調再製出來 (Smith, 2005)，或可看成從微觀的層次呼應博蘭尼聚焦於生活形式的劇烈轉變如何造成社會錯位。改寫 Giddens (1991) 的話

來說，博蘭尼關注的不是關於生活機會（life chance）的解放政治，也不是關於生活風格（life style）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而是構成本體安全感必要的存身居所、社會關係和精神寄託，亦即，生活形式的政治（politics of form of life）。

《經驗之歌》的最後一首〈古代吟遊詩人之聲〉，完成於法國大革命那年，布雷克以先知式吟遊詩人的角色出現在自己的作品裡：

快樂的年輕人到這裡來：
看那綻放的早晨，
新生的真理形象。
懷疑已逃跑且理性的雲層，
秘密爭論和狡猾戲弄都已遠遁。
蠢事是座無盡頭的迷宮，
錯綜的根迷惑她的路，
多少人在此墮落！
他們整晚在死人白骨上顛躓踉蹌；
自覺想知道的皆已知道；
應受引導卻好為人師。

布雷克鼓勵年輕人勇於離經叛道，掙脫傳統觀念加諸心靈的枷鎖；博蘭尼的《鉅變》，不就是與布雷克唱和的現代吟遊詩人之聲？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布雷克

2007 《布雷克詩選》，張熾恒譯。台北：書林。

2012 《天真與經驗之歌》，楊苡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Blake, William

2007 *Selected Poems of William Blake*, trans. by Chi-Heng Chang.
Taipei: Bookman Books.

2012 *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trans. by Yi Yang.
Nanking: Yiling Press.

馬克思

2017/1867 《資本論（第一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
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台北：聯經。

Marx, Karl

2017/1867 *Capital, Volume I*, trans by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博蘭尼

2017 《鉅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

Polanyi, Karl

201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trans. by Shu-Min Hua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韋伯

- 1989/1895 〈比較宗教學導論——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收錄於《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康樂、簡惠美譯。台北：遠流，頁 53-99。

Weber, Max

- 1989/1895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Ethics and the World Religions,” in *Selection from Max Weber, Volume II: The World and Religion*, trans. by Le Kang and Hui Mei Jian.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pp. 53-99.

遠志明

- 2001 《神州懺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台北：台視文化。

Yuan, Zhiming

- 2001 *China's Confession: God and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a*. Taipei: TTV Cultural Enterprise.

外文部分

Adelman, Jeremy

- 2017 “Polanyi, the Failed Prophet of Moral Economics,” *Boston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s://bit.ly/2sohHf5>

Anonymous

- 1791 “The Baker’s Glory, or, the Conflagration,”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bit.ly/33SSNrD>

Blake, William

- 1988 *The Complete Poetry & Prose of William Blake* (newly revised)

edition), ed. by David V. Erdman. New York: Anchor Books.

Block, Fred

2003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 275-306.

Block, Fred and Margaret R. Somers

2016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er, Roland

2009 “E. P. Thompson, Antinomianism, and the Theology of William Blake,” *Sino-Christian Studies* 8: 31-52.

Carlyle, Thomas

1853/1849 *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igger Question*. London: Thomas Bosworth.

Collings, Samuel

1791 “Conflagration! Or the Merry Mealmongers,”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bit.ly/2ZkRYEx>

Damon, S. Foster

1965 *A Blake Dictionary: The Ideas and Symbols of William Blake*.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Dale, Gareth

2016 *Karl Polanyi. A Life on the Lef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ickens, Charles

1854/1907 *Hard Times*. London: J. M. Dent.

Flomenhoft, Gary

2016 “Escaping the Polanyi Matrix: The Impact of Fictitious Commodities: Money, Land, and Labor on Consumer Welfare,”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74: 98-123.

Fores, Samuel William

1791 “A Bon Fire for the Poor or the Shame of Albion Exposed,” *The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bit.ly/2L3Rq0D>

Foucault, Michel

1995/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London: Polity Press.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Hobsbawm, Eric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Kuttner, Robert

2014 “Karl Polanyi Explains It All,” *The American Prospect*. Available at <https://prospect.org/article/karl-polanyi-explains-it-all>

Lemke, Thomas

2011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U Press.

Lewis, C. S.

- 1947 “Preface,” in C. S. Lewis ed., *Essays Presented to Charles Willia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xxiv.

Margalit, Avishai

- 1998 *The Decent Society*, trans. by Naomi Goldbl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Robbie, Kenneth

- 2000 “Literature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Kenneth McRobbie and Kari Polanyi-Levitt eds., *Karl Polanyi in Vienna: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London: Black Rose Books, pp. 85-106.

Özveren, Eyüp

- 2007 “Wher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lur: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Stavros Ioannides and Klaus Nielsen, eds.,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oundaries,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p. 185-212.

Polanyi, Karl

- 1947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Commentary* 3: 109-117.
- 1968/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George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Boston: Beacon Press, pp. 139-174.
-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Polanyi, Karl, Arensberg, C. M. and Pearson, H. W. eds.

1957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olanyi-Levitt, Kari

1990 “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Kari Polanyi-Levitt ed.,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London: Black Rose Books, pp. 111-124.

Rose, Nikolas

2006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yer, Andrew

2010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Smith, Dorothy E.

2005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Thompson, E.P.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lican Books.

1993 *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William Blake and the Moral Law*. New York: New Press.

Vice, John

1993 “Reviews: William—A Man Without Marx,” *Blake/An Illustrated Quarterly* 26(4): 162-165. Available at <http://>

bq.blakearchive.org/26.4.vice

Walker, William

1993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Britain*,” in Richard R. Nelson 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8-191.

Wikipedia Contributor

2019 “Muggleonianis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Available at <https://bit.ly/2KWSmFr>

White, Malcolm

2017 “The Light in the Dark Satanic Mills,” *WRAC*. Available at <https://bit.ly/329AnBv>

Abstract

Following a clue mentioned by Kari Polanyi-Levitt, this paper proposes a Blakean read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intra-textual and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key words frequently used in linguistic contexts relevant to “satanic mill” from works by Polanyi, we argue that “satanic mill”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institutional ensemble of poor relief, including legislation and associated establishments, which aimed to convert labor into a fictitious commodity by way of humiliating and dehumanizing moral correction.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mbolism and doctrine of the antinomian Muggletonianism, Blake critiques the human image made from abstractions, because human beings justify their selfish motiv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their human fellows traditionally held to be created in God’s image. Polanyi criticizes the postulate of *homo economicus*, in which the market mentality of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used humankind to turn its back on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and should be blamed for social disasters in England’s early industrialism and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is through the Muggletonian concept of men that Polanyi’s critique of market society echoes Blake’s romantic th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industrialism.

Keywords: Christian concept of man, Karl Polanyi, Market Society, Romantic Theology, William Blake

Long Summary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cond part of Karl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01/1994) was headlined "Satanic Mill," obviously an allusion to the famous literary quotation in the work of England's mystic poet William Blake. In the Karl Polanyi scholarship,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contrast between that conspicuous headline and a disproportionate lack of attention. Even in what little literature exists on the topic, "satanic mill" is generically mentioned as a rhetorical move, or is understood as a metaphor that symbolizes the diabolical and dreadful sweatshops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dustrialism (Block, 2003). Following the clue mentioned by Kari Polanyi-Levitt (1990) that "the shock of the passage from Red Vienna to the slum of Britain, the scars of Blake's 'dark Satanic Mills' on the face of England's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and on the psyche of its industrial working-class, burnt itself into his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tries to uncover the relevance of "satanic mill"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lliam Blake's creative idea.

By intra-textual and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words (mill, dislocation, desolation and habitation, among others) which frequently appear in linguistic contexts relevant to "satanic mill" from works by Karl Polanyi (1947; 1968/1957; 2001/1994), here it is argued that the first implication of "satanic mill"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institutional ensemble of poor relief in the early stage of England's industrialism, including legislation and associated establishments aimed

to convert labor into a fictitious commodity and to compel the poor to adapt to the discipline required by the emerging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 by way of humiliating and dehumanized moral correction. However, this reading in terms of political economy doesn’t address the Blakean relevance of “satanic mill.”

I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that “dark satanic mill” in Blake’s poem refers to yet goes beyond the Albion Flour Mills in Southwark, London, the first major factory completed in 1786, which was gutted by fire in 1791. Drawing on E.P. Thompson’s (1993)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the Muggletonian archive, we examine Blake’s *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symbolism (tree, the fall, beast, etc.) and doctrines (there is no God but the glorified Man Christ Jesus; there is no Devil but the unclean Reason of men) of the antinomian Muggletonianism with which Blake affiliated.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Blake employed the metaphor of “the mind-forg’d manacles” to denounce that the very image of man had been defiled by the “human abstract” (a divine image):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justified their selfish motiv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their human fellows traditionally held to be created in God’s image (*the* divine image). What “London” portrays is the very “dark satanic mill” dominated by “the mind-forg’d manacles,” a place of desolation where human beings choose to put unclean Reason instead of Mercy and Forgiveness.

Adopting the foregoing Blakean perspective, we argue that Polanyi’s critique of the abstrac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echoed Blake's "mind-forg'd manacles." He denounces the postulate of *homo economicus* and associated "market mentality" of formal economics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for having turned humankind's back on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and blaming it for the veritable disaster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England's early industrialism and for global disasters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is through the Muggleonian concept of men that Polanyi's critique of market society echoed Blake's romantic th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With Marx, Weber and Foucault as points of reference, we take a further step to triangulate the uniqueness and originality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s anatomy and critique of market capitalism. Firstly, the so-call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sm according to Marx (2017/1867) includes the forcible creation of a class of outlawed proletarians, the bloody discipline that turned them into wage laborers, and the disgraceful action of the State to accelerat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y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exploitation of labor. According to the foregoing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so-calle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market capitalism also includes conversion of common people into masses of a fictitious commod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moral violence, among others. Secondly, in contrast to Weber's (1989/1895) concern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view derived from religious beliefs on economic behaviors of particular social groups, Polanyi is concerned with how the religious concept of man justifies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human beings and has differential impacts

o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Thirdly, Foucault (1995/1975) observed an emerging form of power from the spatial deployment of Panopticon, while Polanyi noticed how the morally unbearable situation of poor relief establishments compelled the poor to work with the discipline required by the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

Polanyi's critique of market capitalism thu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social prerequisites for market capitalism are the conversion of labor into a fictitious commodity and the adaptation of workers to the discipline required by the competitive market. Creation of these social prerequisites involves extra-economic measur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ized physical violence by the State and institutional humiliation aiming at moral correction. The human abstraction of labor as a fictitious commodity was no less than a total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Western society, since it justified and rationalized the mu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Drawing on the foregoing Blakean re-read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nd situating with reference to Marx, Weber and Foucault,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elements for a Polanyian approach to biopolitics,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man as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for particular institutions, social mechanisms in and through which moral correction could be enforced with institutional humiliation, and forms of life as an entry point for analysis into a specific institutional order.

Reference

Block, Fred

- 2003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 275-306.

Foucault, Michel

- 1995/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Marx, Karl

- 2017/1867 *Capital, Volume I* (Complex Chinese ed.), trans by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Polanyi, Karl

- 1947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Commentary* 3: 109-117.
- 1968/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George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Boston: Beacon Press, pp. 139-174.
-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Polanyi-Levitt, Kari

- 1990 “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Kari Polanyi-Levitt ed.,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London: Black Rose Books, pp. 111-124.

Thompson, E.P.

1993 *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William Blake and the Moral Law*.
New York: New Press.

Weber, Max

1989/1895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Ethics and the World Religions,” in *Selection from Max Weber, Volume II: The World and Religion*, trans. by Le Kang and Hui Mei Jian.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pp. 53-99.